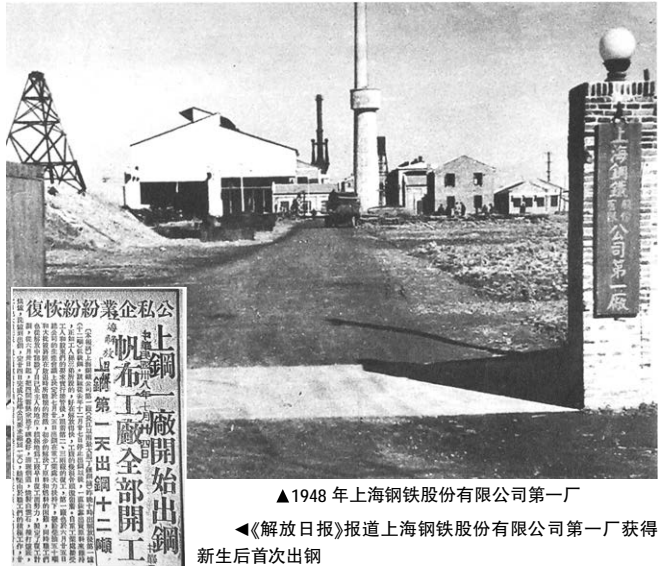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推动中国宝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伟大企业

硝烟散去之后

——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新生



▲1948年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厂

▲《解放日报》报道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厂获得新生后首次出钢

1946年12月，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下辖第一厂（上钢一厂前身）、第二厂（上钢二厂前身）、第三厂（上钢三厂前身）列为第三厂。其后，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历经发展，演变为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并于1998年汇入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1949年1月初，中共中央作出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并做好接管工作的指示。据称，中共上海市委组建了一支以工人为核心的6万人的人民保安队，阻挠国民党政府破坏工厂、拆迁设备、转移物资、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计划。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也不例外，一厂、二厂、三厂都成立了人民保安队。

眼看上海即将解放，一厂、二厂、三厂的一些私方股东筹划逃离上海，已无暇顾及厂务。为防止国民党军和工贼、特务趁乱破坏工厂，上钢公司地下党组织及时要求各厂护厂队员住在厂房，睡在机器旁，日夜守护工厂。三厂的人民保安队以平炉、马达间、油塔等关键设备为重点保护对象，将全厂划分为若干区域，分工轮值守护。国民党军果然下了黑手，趁溃退之际在三厂铁轨下埋了三颗手榴弹，只要复工后火车驶过，就会触发爆炸。这一毒计未能逃过保安队员警惕的眼睛，隐患被及时排除了。5月下旬，人民解放军陆续抵达，一厂、二厂、三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硝烟散去，首要之举是开展各厂的

接管工作。护厂队员在接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本厂军代表的指导下很快成立了工会，并发挥工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配合军代表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激发工人们翻身做主人的光荣感、自豪感和使命感。在觉悟了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各厂均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清点造册和移交工作。

接管工作结束后，迅速恢复生产成了当务之急。一厂、二厂、三厂均在1948年底就停止了生产，靠变卖原料勉强维持工厂的存在，停业待工的工人，更是生活穷困，难以维持基本的生计。各厂军代表进驻后，当即落实了工人薪水的发放，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稍后，又根据工人劳动强度高但待遇低的不合理情况，想方设法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并废除了抄身制等侮辱人的霸权制度。在接管过程中，军代表注重倾听工人群众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设身处地解决他们的需求，并通过开办学习班，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

“解放前的厂长、把头何曾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过我们？”工人们切身感受到当家成了工厂的主人后，焕发出了无穷的活力。接管初期的上钢公司生产原料、辅料和燃料告缺，平炉和轧钢设备均需大修。通过多方努力，公司军事特派员办公室从没收的国民党政府仓库里调来了一部分生铁和煤炭，可这仍然不足以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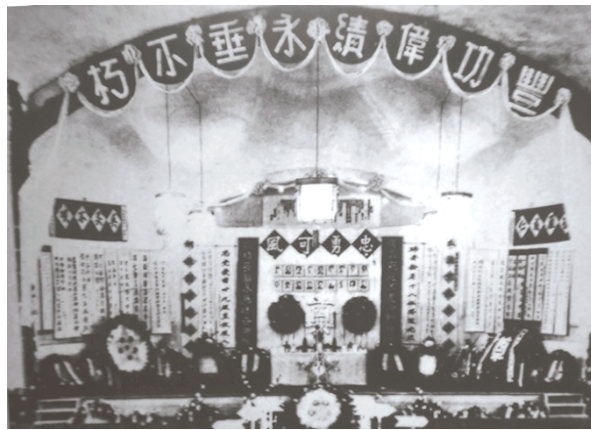
生产。工人们得悉后，便自发组织起来，赴虬江码头拆解废船，解决了废钢需求。过去要彻底修好一座平炉，至少需要半年；现在只花了短短的一个月，一厂的平炉就修复好了。7月12日清晨5时15分，三厂炼出了该厂解放后的第一炉钢水。7月21日，一厂平炉出钢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但运油船因落潮搁浅在了新桥，无法驶进工厂，眼看出钢时间要被拖延，50余名工人自发组队远赴新桥卸油。22日，经过白天的紧张工作，工人们卸下了10吨油，这样运油船载重就减轻了。晚上，工人们趁着涨潮，一鼓作气把运油船拖到厂区码头，克服了出钢的最后障碍。23日晚，一厂也炼出了该厂解放后的第一炉钢水。

7月24日，上海刮起了强台风，黄浦江水漫进三厂，复产不久的平炉面临断电后钢液冻结炉体损毁的严重威胁。在此危急时刻，在军代表和工厂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人们挺身而出，与狂风暴雨搏斗了整整一个昼夜，终于在25日晚安全放出了钢水，保住了平炉。

解放后的1949年6月到12月，整个上钢公司共生产了3182吨钢锭、2376吨钢材，创造了同期历史纪录。

公司有不少具备真才实学的技术人员，各厂要稳产、达产，必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中不少人既对旧社会感到不满，又因对共产党不了解而与新政权保持着距离。为了扭转他们的谨慎心态，各厂军代表下沉到技术人员中间，每天和他们共同学习一个小时，每周再加半天，学习党的政策和指示，并联系本企业实际开展讨论。坚持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他们增进了对党的了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本质区别。

在稳产、达产过程中，各厂党组织注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于技术人员的职位和薪水，基本采取“原封不动”的办法，以安定他们的情绪，解除其后顾之忧。对于其中学有专长者，均予以重用，使他们感受到党是信任他们的、真心依靠他们的。如被提拔为公司副经理的孙德和，被分别提拔为一厂技术副厂长和工会主席的席与渔、黄厚锡等。不仅如此，就怎样稳产、达产，各厂军代表经常与他们磋商，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给他们相应的职权。在党的信任和支持下，各厂技术人员心情舒畅，干劲充足，为生产再上台阶作出了重要贡献。



重庆解放后，第二十九兵工厂召开护厂烈士追悼大会

1949年初，随着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败退，国民党加紧了对“后方”的举动，妄图通过肃清异动，积聚战争资源，为垂死一搏提供支撑。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兵工生产基地，境内有多家直接和间接与兵工生产有关的企业，此时更是国民党的经营重点，国民党特务、军警密布各厂，监视着工人的一举一动。

研判新敌情，中共川东特委作了针对性工作部署：农村不再搞武装起义，把华蓥山起义失败后的人员、武器调回重庆，加强城市工作；为了防止国民党在溃败时破坏工厂和城市，将工作重心转到团结和带领广大市民和工人阻止敌人破坏，利用一切力量保护城市和工厂的完整。

第二十九兵工厂副工程师刘家彝是中共川东特委工运系统护厂领导小组成员。9月，根据中共川东特委的指示，他带领活跃在第二十九兵工厂的地下党员发动群众成立了护厂领导小组，全厂各所（分厂）也分别成立了护厂队。护厂领导小组争取到厂长王怀琛的支持，成立了“护厂应变委员会”。利用这一公开的身份，护厂领导小组在工人中适时喊出“工厂、机器是我们的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也赶不走”等口号，并组织工人用铁钎、铁棒等为武器开展巡逻，在发电厂周围架设电网，实行武装护厂。

随着新中国成立、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蒋介石叫嚣：“即使重庆失守，也要全城爆破，给共军留下一个烂摊子。”秉承主子的旨意，11月20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重庆召开会议，研究破坏重庆各重要工厂的罪恶计划。

第二十九兵工厂是敌人的重点破坏目标，国民党特务没有料到第二十九兵工厂工人的斗志是如此坚决，特别是发电厂，特务们连门都进不去，恼羞成怒之下，国民党大渡口片区爆破指挥官陈海初决意杀一儆百，于11月26日深夜将积极护厂保家的中国民主同盟大渡口区队长、火砖部司磅工人胥良逮捕，并在28日秘密杀害。28日，国民党当局将第二十九兵工厂厂警撤出，换上执行破坏计划的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简称“内二警”）。下午，爆破队进厂，向厂长王怀琛宣布训令，要求全厂立即停产，工人护厂队立即解散，工人离厂。11月29日，内二警将工人分批押送出厂，全厂实行戒严。同时，国民党“同心号”“同德号”登陆艇载满TNT炸药，停靠在第二十九兵工厂一号码头。

30日凌晨2时，国民党特务将10余吨炸药分别安放在发电机组、炼铁炉、炼钢炉等要害部位，并接上雷管。千钧一发之际，从南温泉方向传来了解放军的炮声，正准备引爆的国民党特务吓破了胆，启动爆破定时装置后仓促逃窜。拂晓时分，一直守候在厂外的发电厂负责人、工程师简国治和刘家彝发现敌人逃跑了，立即带领20余名护厂队员匆匆赶回工厂。他们排成长龙，用绳索和扁担等简陋工具，冒着生命危险把锅炉房里的两箱炸药向空地上搬运。随后，他们又紧急转运发电机房里的100多箱炸药。30日早晨8时许，当发电机房里的炸药被搬得只剩下三分之一时，定时炸弹起爆了，正在搬运炸药的黎助文、简国治、刘家彝、古传贤、曹仲良、应文字、田玉清、陈建铭、任安炳、董定盛、柳传、王吉之、王昌、吕治平、张金山、罗万忠、张国梁等十七名勇士壮烈殉难。

这十七名勇士连同早两天牺牲的胥良血洒大渡口，保住了锅炉等重要生产设备，为当天解放的山城献上了一份厚礼，为工厂在解放后恢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爱国爱厂、舍生忘死的精神，值得后人永远缅怀和学习。

重庆解放后，第二十九兵工厂召开护厂烈士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护厂烈士。1950年2月，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这十八名烈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了缅怀先烈、教育后代，解放后，相继修建了重钢烈士墓、重钢护厂烈士陵园、重钢烈士纪念碑。

牺牲在山城解放前的最后一刻 ——兵工署第二十九兵工厂十八勇士护厂记

盼着《山那边哟好地方》唱响的时刻

——中国电力制钢厂工人迎接解放纪实

1939年，中国电力制钢厂和云南钢铁厂先后筹建。1952年，前者更名为西南工业部208厂，后者更名为西南工业部209厂。1953年，两厂合并为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西南钢铁分公司105厂。1955年，105厂更名为昆明钢铁厂。2021年，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由中国宝武托管。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全国解放已为期不远。为了贯彻党中央在蒋管区开辟第二战场的指示，中共昆明市委加强开展工人运动，以动摇国民党在后方的统治，为迎接解放创造条件。

开展经济斗争是中共昆明市委加强工人运动的突破口。1949年4月起，中国电力制钢厂资方以“时局恶劣，生意不好做，无法维持”为由，减扣工人工资，并企图遣散工人，变卖设备，携款离厂。工人们只能得到些许生活费，为了活命，有的工人去帮附近农民插秧混口饭吃，体力弱的只好挖野菜充饥。不满、愤懑在工友间不断蔓延，势成燎原。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适时指导制钢厂进步工人成立“工人联谊会”，鼓励他们带领工人罢工，与厂方作坚决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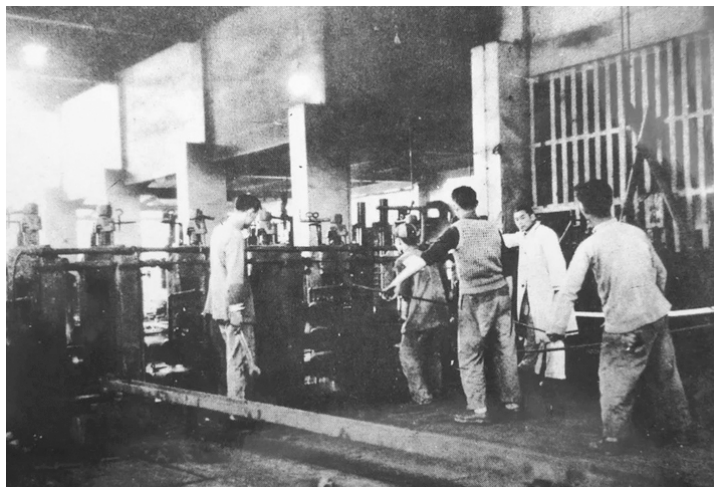
7月7日清晨，制钢厂轧机停转，电炉停止出钢，全厂绝大多数工人汇聚厂部办公楼前，高呼：“我们要活命！”“反对扣发工人工资！”“打倒工贼！”等口号，提出恢复全薪，不得无故开除和辞退工人等正当要求。厂方虚与委蛇，狡猾地劝工人们先复工，再指派代表与厂方谈判，企图以拖延时间来冲淡工人的反抗。对于厂方的险恶用心，工人们洞若观火，断然拒绝，并关闭了工厂大门，摆出了斗争到底的姿态。罢工斗争一直持续到下午五



中国电力制钢厂厂牌

点多钟，厂方无计可施，终于答应了工人复工条件。

通过开展“七七罢工”，制钢厂进步工人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提升了阶级觉悟。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决定趁热打铁，在制钢厂工人中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工人同盟中国电力制钢厂支部，将工人运动内容从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制钢厂工盟支部成立后，首先开展发展壮大工作，将支持工人斗争的进步职员和厂警卫队员吸收为盟员，并顺势在厂警卫队建立了工盟小组。从此，厂警卫队被掌握在了地下党手中。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工人，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指示制钢厂工盟支部通过“工人联谊会”团结全厂各方力量，向厂方施压，要求成立由厂方代表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的“厂务管理委员会”，



中国电力制钢厂工人在轧钢

厂内一切重大事务必须经过“厂务管理委员会”讨论同意才能生效。经过五天的艰苦谈判和斗争，厂方最终被迫同意这一要求。制钢厂“厂务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在昆明开创了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的先例，为下一步的斗争提供了组织和人员上的保证。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挺进云贵

原，昆明解放指日可待。为了防止国民党军狗急跳墙，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屠杀，中共昆明市委发出“保厂护产，迎接解放”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在各企业做好如下工作：掌握武器弹药；控制武装警卫力量；监视特务行动；调查、登记企业物资、资金和设备；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确保一旦有需求便可立

即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以党的力量较强的企业为中心，组织区域联防，实现一厂有事各厂支援。制钢厂地下党员、工盟支部盟员和“工人联谊会”成员立即行动起来，组建了护厂队。护厂队员在密切监视厂方动向的同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刘邓大军解放西南“四项号召”，中共昆明市委“约法八章”等宣传材料秘密投放到工厂管理者的家中、敌特分子的驻地，敦促他们认清形势，弃恶从善。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一些猖獗的顽固分子不敢再吭声，有的敌特分子收到文告后吓得仓皇出逃。

12月9日深夜，“云南王”卢汉通电全国，举行起义，昆明上空升起了五星红旗。听闻胜利的消息，制钢厂里一片欢腾，工人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山那边哟好地方》《金凤子开红花》，并当即成立自卫队，日夜巡逻，保护生产设备，维持秩序。蒋介石不甘心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破产，遂发动嫡系部队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进攻昆明，妄想扼杀云南起义。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共昆明市委认识到，保厂护产的前提是保住昆明，必须将武装护厂的力量立即转移到配合起义部队保卫昆明的工作中，于是将各厂大部分的武装护厂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5000多人的义勇自卫队，担负城防和警戒任务。初尝胜利的制钢厂自卫队员迅速响应组织的号召，17名队员当即加入昆明义勇自卫队工人大队，负责城防的站岗放哨。

12月20日，刘邓大军杨勇兵团星夜驰援昆明，进抵曲靖地区的沾益，围攻昆明的国民党军惧怕腹背受敌，于21日仓皇撤退，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